

教师生涯

叶寿桢 著



金陵书社出版公司

教 师 生 涯

叶寿桢 著

金陵书社出版公司
香 港

教师生涯

叶寿桢著

出版印刷发行：金陵书社出版公司

(香港九龙中央邮局71446信箱)

开本：850×1168mm 1/32

版次：2007年4月第一版、2007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字数：140千字 印数：1~1000本

国际统一书号：ISBN 962-440-850-5

定价：港币 24 元

人民币 24 元

北方的冬天，天黑得特別早，在我從飯廳回宿舍的路上，黑暗中，迎面而來的人似乎在喊我：

“李老師！”

我的心顫抖了一下，好久沒有人這樣喊我了：革命師生直呼我的姓名李從文，牛鬼蛇神隊裏的同伴則都叫我老李。老師，這我大學一畢業就聽慣了的稱呼，此時於我已是如此的陌生與高不可攀，以致我不相信這聲音是在叫我。我正想從路邊走過去，然而來人已經站在我的面前，伸出她的右手：

“李老師，不認識我了？”

“張曉雯！”昏暗的路燈下，我認出她是三年前畢業的一個女學生。我驚詫、惶惑不安地表示歉意，“不、不、不！我想不到會是你。”

我教她們數學分析時，她是班裏的分析課課代表。她五官端正，溫和文靜，畢業時曾和她的同班同學孫志斌一起來向我告別，並送我一張紀念卡片。畢業後，我們也曾通過幾封信。後因世事艱辛，我沒有給她們回信，我們的聯繫也就中斷了。

張曉雯的突然出現使我猝不及防，避開她已經來不及，和她談談，我能和她談些什麼？我自慚形穢，又一腔無法訴說的冤屈，緊張、慌亂、害怕、羞辱，我心裏什麼感覺都

有。如果普天下的人都不認識我，讓我再下賤，再爲人所不齒，再受羞辱，我都可以忍受，但要讓那些平素敬重我、信賴我的人知道我的卑劣、無恥——並不真是我的，而我自己又無法洗刷清楚的卑劣、無恥，我心裏真痛苦得痛如刀剎。我自問，我怎麼還能這樣厚顏無恥地在這個世界上偷生？

“這幾年你都好嗎？”她關切地問我。

“好、好、好，一切都還好！”我想哭，但還是強忍着向她問候，“孫志斌沒有和你一起來？”

“他沒來，他在學校裏當了第一把手，什麼事都得管。他叫我代向你問好。”她臂上戴着戰鬥隊的紅袖套，頭上剪着齊耳的短髮，軍棉襖外皮帶紮得緊緊的。一反學生時代的溫和文靜，頗顯得英姿勃勃，矯捷爽朗，“志斌和我一直都想來看看你，可就是沒有時間。”

“大家都很忙。”我支吾應付着。

“黃文輝、劉曉明、陳浩都和我在同一個學校工作。我來時，他們也都叫我代向你問好。”

“謝謝你們都還記着我！”我囁嚅着向他們道謝。我已記不清那個是黃文輝，那個是劉曉明，也無意從記憶中再去找回他們。

我巴不得談話早點結束，但她似乎還有些事要告訴我：

“老同學在一起談起在曲阜師院的生活，大家對你的記憶力都很佩服，都說聽你的課很有味道……”

“那麼多的同學在一起，倒是挺有意思的。”我順着她的口氣講，心裏急於想離開。

“師母她好嗎？”

她問的是朝露，朝露兩年前就已經離開人世。朝露好

麼，我能告訴她什麼呢？

“好、好，她一切都很好！”我是怎麼回答她的，我自己都聽不清楚。

我怕談話繼續下去，就撒了個謊：

“六點半我們還要開會，明後天有空請再來玩玩！”

在那階級鬥爭天天講的年代裏，一個牛鬼蛇神，除了傳呼他去勞動，去交代問題，是從來不會有人去理他的。現在要在人來人往的大路上和一個年輕女子說東道西，是很不得體的，這會招致非議，帶來麻煩。更何況我和她的談話也根本無法再繼續下去，我不願讓她知道我的處境，但我又不能裝作自己沒有問題。癆病人自明白，我強忍着心中的痛苦，就借口晚上還要開會以求尽快走開。

“我明天一早就要走。原想今晚把這份材料交給馬老師（馬老師是我校的材料組組長）後就去看你，真不湊巧！”說時，她擡了擡手中拿着的公文包。臨別時，她和我握了握手，“以後有機會，我會再來看你！”

她的手溫暖了我的心，使我窒息了很久很久的情感像沖決堤壩的激流，突然迸射而出。在回宿舍的路上，我淚水遏止不住地直往下流，幸好天黑別人看不見。回到宿舍後，關上門，我情不自禁地哭了出來。

老師！我那裏還是一個老師？要是張曉雯知道我現在的情況，她還會喊我老師嗎？一個持刀強姦婦女的壞分子，一個漏網右派，一個出身反動，一貫敵視共產黨、敵視社會主義的現行反革命分子，連做人的資格都沒有，又會有誰把他當老師！我哭得很傷心，喊我一聲老師，竟使我在宿舍裏呆坐了一夜！

二

當我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時，我心中十分沮喪。因為錄取我的不是北京大學，復旦大學，而是我在填志願時，為湊數隨隨便便填上的山東大學數學系。

記得畢業前夕，在團支部組織的一次談心會上，同學們在談了各自的理想、抱負後，要我也談談自己的打算。我中學讀書時十分靦腆，從來沒有在什麼會議上主動發過言，那天去，也只是想聽聽，根本沒有想到要發言。但在同學們的一再催促下，我還是說出了自己心裏的矛盾：我從小喜歡捉蟋蟀、捉知了、摸魚、摸蝦、掏鳥窩……根據自己的愛好，我準備報考生物專業。但就在這次談心會的前幾天，我哥哥拿給我一本載有《良好的開端》一文的《中國青年》，說龔升（當時為陳建功的研究生，後任中國科技大學數學系系主任）還只有二十幾歲，就在解決比貝爾巴赫猜想時，取得了世界領先的結果。他說我數學很好，應該去考數學！我兄長接濟我讀書，他對我說話從來就是命令式的。我不能無視他的建議，但我又惜不得放棄自己的愛好，左思右想，一時真不知該去報考什麼專業。

我說自己不知該報考什麼專業為好，但第二天校門口的黑板報上卻刊出了一篇題為《未來的華羅庚》的報道，說我在向科學進軍的感召下，決心要像華羅庚、龔升一樣，為祖

國的數學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。這篇失實的報道使我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——因為從此全校同學幾乎都知道我李從文學習很好，但同時也造成了我非報考數學專業不可的騎虎難下之勢！二十世紀五十年代，中學裏的學習尖子在考大學時，一般都是報考綜合大學的數學、物理專業。我高中讀書時，除了體育、語文，我每門課的學期平均成績全都在九十五分以上。我可以向任何方向發展，但我虛榮心很強，好勝心也很強，既然大家都已知道“我要獻身數學事業”，那就報考數學算了！反正我數學也很好，有兩個學期，我的數學平均成績還都是滿滿的一百分。我不怕今後在數學上作不出成績！

在填報志願時，第一志願第一學校，我填報了復旦大學數學系。大家都說接下去的志願不能填得太高，北京大學當然不能再作為後續志願來填。那時除了北大我真不知道還有那些綜合大學可供選填，於是便去查閱《考生手冊》。在《考生手冊》中翻到山東大學在青島，因大家都知道青島是避暑勝地，為湊數，便笑着建議我的同桌同學也填報山大，說考取山大後，我們可以一起到青島去避暑——說來也挺可笑，他居然接受了我的建議，和我一樣把山東大學填入了報考志願的第一志願第二學校，結果我們又雙雙都被山東大學所錄取！

我對自己考取第一志願第一學校信心十足。填報其他志願，只是隨大流，像班上的所有同學一樣，把志願表上的三個志願九個學校填填滿而已，可我怎麼也想不到高考時我卻因頻頻腹瀉，考試無法正常發揮，結果竟偏偏為山東大學所錄取！看來在這個世界上，一個人到那裏去，會遇見些什麼人，一切都早已命中注定。我到山東大學去報到，只不過是我在參與天地造化，按着自然規律，隨着整個社會在作不可

逆轉的運動罷了！

山東大學是一所不錯的大學，可一個“未來的華羅庚”怎麼能只考上一個山東大學？這太丟人現眼了！我高中讀書時心中已暗暗戀上一位低班女同學，她叫柯朝露。她要我考取後告訴她一聲，離家前一定要到她家裏去玩玩，可我怎麼去見她呢？我羞於見人，羞於見到學校裏每一張熟悉的面孔。如果我可以再考，我一定會放棄山東大學，在家耽上一年，等第二年再去考。可我不具備這樣的條件：當時的高考制度不允許已錄取的學生放棄再考，更何況當時除了學校，我連住的地方也沒有。在家耽上一年又從何談起？幸好當時收到錄取通知書沒幾天，就得到山東大學去報到。同被錄取在山大的高中同學都抱怨這太匆忙了，來不及準備，可我還是在提前離開了溫州，和幾個早走的同學前往山大去報到。因為這樣我可以免去被每一個所碰到的老師、同學所盤問。

到山東大學去報到，是我第一次出遠門。雖然我情緒低下，但途中所見到的一切都無不使我感到新鮮與好奇：在金華火車站月臺昏暗的燈光下，當火車拉着尖銳刺耳的汽笛，像一頭巨大的黑色怪獸，挾着颶風，以排山倒海之勢從我面前飛快碾過，然後慢慢、慢慢停下來的时候，我心中感到十分恐怖。我想看個清楚火車到底是什麼樣子，但同行的同學已推着催我快上火車；火車到達杭州時，已是晚上十點多，我們住不起旅店，就把隨身攜帶的草席鋪在西湖邊的草地上，我們躺在草席上望着月下的西湖，準備一俟天亮就去遊岳墳、玉泉、靈隱。城在湖光山色中，湖光山色在城中，月下朦朧的西湖顯得分外的神秘與幽深，耽在湖邊，簡直讓人覺得仿佛我們都進入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童話世界；途經上海

時，聽說南京路最熱鬧，我們就在南京路上人擠入，聽着上海人的綿綿軟語，仰望高聳入雲的國際飯店……外面的世界多精彩！連讓人靜下來思索一下的時間都沒有，我的注意力已全被外面的世界所吸引。

晨光熹微，曉霞滿天，海面風平浪靜，一群海鳥在棧橋的盡頭飛翔、盤旋，他們時時俯衝下去掠擊海面，時時又扶搖直上，直刺藍天。我第一次踏上青島的土地，正是城市剛剛從睡夢中醒來的時候，除了全神貫注正在打掃馬路的清道夫和睡眠惺忪，坐在馬車駕馭座上等着接客的馬車夫，路上沒有幾個行人。晨曦中尖尖的教堂塔樓，坐落在草坪、綠樹中間的紅瓦粉牆小屋，有的草坪周圍還打上短短的、彩色各異的柵欄木樁……青島的建築、色彩實在令人着迷，置身其間，我覺得自己仿佛不是在中國，而是來到了某個中世紀的北歐城鎮。我喜歡大海，我更愛青島這塊美麗神奇的土地！一到青島，新生接待站的高年級同鄉同學就拿着名單來找我們，他們領着我們去註冊報到，去遊棧橋、魯迅公園、水族館……短短的幾天時間，令人目眩神暈的時空變化，將我的腦子滌蕩得一片空白。剩下來，只是我如何去認知、熟悉並適應這個業已到來，但對我來說還是非常陌生的未知世界。

大學裏，膳食是免費供給的。早餐，每天一碗稀飯、兩個饅頭、兩個雞蛋，有時還加兩根油條。中、晚餐，幾乎餐餐都有魚肉，都有紅燒對蝦。吃了一個多月，我的體重增加了十幾斤。入學時，我頭暈嚴重，血色素只有六點八克，此時去復查貧血，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的血色素已恢復到十二克——完全正常！離溫前，我不敢去見朝露，到校後，由於掐不斷對她的思念，我壯着膽子給她寫了一信，說我愛

她，說此生爲了她，我一定要學有所成！朝露接信後，立即給了我一個最最明確、最最純真的答復。因爲有了動力，我學習很刻苦：周末、星期天，同學們去逛馬路，遊公園，我就一個人蹲在空無一人的大教室裏看書；同學們遇到難題，都去請教輔導老師，或“參考參考”別人的作業，可我即使化了很多很多時間還做不出來，也要堅持下去，通過獨立思考來完成；上課時，老師用普通話講課聽不懂（因爲在故鄉我們從來不說普通話），我就徵求任課老師的意見，逐字逐句去啃一本老師指定的參考書……功夫不負有心人，第一學期結束時，我以全優的成績爲老師所器重。

“忽如一夜春風來，千樹萬樹梨花開”有人用這樣的詩句來形容五七年的大鳴、大放、大字報。我覺得大鳴、大放、大字報是一場劫難，並沒有像“千樹萬樹梨花開”這樣美，但在校園裏的突然發生，卻確只是一夜之間的事情！前一天，學校裏的教學秩序還是好好的，可第二天早晨去餐廳用餐時，校園裏已貼滿了譴責、揭露校黨委不懂學術，專事迫害知識份子，迫害青年學生的大字報。到教室裏去上課，教室裏也沒有幾個人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問問你，誰也不知道今天還上課不上課，結果老師也沒有來。可以說，這一天是我正常學習、生活的終結，從此我踏上了一條非常非常崎嶇，充滿變數，充滿險惡的人生道路。

在數學樓的南牆上有一張“血淚的控訴”的大字報，控訴人是一個二年級的同學，他說自己入學時正值社會上提倡個性解放，僅僅因爲自己年輕單純，個性較強，說了幾句黨、團幹部不要對年青人的生活干預太多，“肅反”中被作爲反革命分子關了起來。肅反積極分子爲了逼他供出其“反

革命同夥”，一天二十四小時輪班提審，不讓他休息，不讓他睡覺。威脅、謾罵、耳光……羈押中，他受盡凌辱，在失掉自由的同時，也失掉了一個人所應有的最起碼的尊嚴。心力交瘁時，他說自己真想一死了之，可一想到孑然一身，無依無靠的白髮老母，他還是活了下來。因為他母親就他這麼一個兒子，他是個孤兒，是母親含辛茹苦把他拉扯成人，他不能棄母親而去……“血淚的控訴”貼出後，圍看的人很多很多，群情激憤，聲援的大字報也紛至沓來，把偌大一座數學樓的牆壁貼得再也找不到一塊可貼大字報的地方，我站在圍觀大字報的人群中，眼裏也噙着淚水。

不知是誰，在通往餐廳的大路旁，在校園的開闊處，在一座大樓的二樓陽臺上開闢了一個“民主講臺”。講臺上裝着麥克風，講臺兩側貼着一副“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”的對聯。每天從早飯時間開始，就有人在講臺上議論時政，針砭時弊。講臺下面總是被圍得水泄不通。議論者講到精彩處，老遠老遠就能聽到台下的鼓掌聲和狂熱的喝彩聲，說到激憤處，台下則口號聲不絕於耳。特別是物理系一位姓王的同學（如果我沒有記錯，他的名字大概就叫王馥郁），他在“民主講臺”上大講“馬克思主義X Y Z，毛澤東思想A B C”。他廣徵博引，深入淺出地說明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東西，大家都還莫名其妙，是一個未知數，毛澤東思想則只是生硬、教條地搬弄馬克思主義。他善言能辯，講得非常生動，甚至到餐廳去用餐路過講臺站住想隨便聽幾句的人，都聽得忘了到餐廳去用餐。“民主講臺”使整座學校都沸騰了。我擠在圍聽的人群中，不附和，不喝彩，我在思索：臺上人講得都是事實嗎？我覺得有些人言之有理，有些人又似乎言過其實。

我是個一年級的學生，對學校裏過去發生的事不太了解，我想我應該多聽聽。

“鳴放”中，富有正義感的青年學生、知識份子對不合理的社會現象進行揭露、批判、衝擊，我認為是必要的，但學校被搞得這麼亂，連課也上不起來，我又覺得這太不應該了：學生到學校裏來是爲了讀書，整天不讀書，東跑西竄去搞什麼運動，這與社會辦學的宗旨根本背道而馳！一個學生在校時不讀書，以後又怎能談得上去報效祖國？特別是看到班裏那些平時不讀書，作業專門抄人家的，一到星期六就把頭梳得油光可鑒，把皮鞋擦得銍光閃亮，專等着晚上去跳舞的同學在鳴放中搞得那麼起勁，上竄下跳，一有機會就指責團支部、班委落後於形勢，落後於運動，我心裏真是反感極了。正是基於一個青年學生這種樸素的求知慾，“鳴放”中，當群情激憤，校、系領導，黨、團干部处于千夫所指時，我却力排眾議，在團支部會議上，在班級會議上，在系裏各種各樣的會議上大聲堅持：“我們一年級同學對學校情況不了解，在運動中看大字報，聽‘民主講臺’都要獨立思考，對的就支持，不對的決不盲從！”這些話現在聽起來似乎十分平常，但在當時那種輿論一邊倒的情勢下，說出來確是需要一定的勇氣。我不計較個人得失，這些話說得那些鼓噪着要改選團總支，改選班委的人個個啞口無言。我乏意識地護衛了系裏衆多黨、團幹部的利益。這樣鮮明的政治態度，“鳴放”中在全校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。爲此，“反右”開始後，我被確認為在大風大浪中經得起考驗的典型，被委以政治學習組組長的重任——其時任政治學習組組長的都是黨員，全系唯獨我一個人不是。

黨支部書記找我談話，叫我爭取入黨，還拿給我一本劉少奇著的《論共產黨員修養》，叫我好好學習，以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。“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，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”書中引錄的這對對聯，我至今還牢牢记在心裏，但對入黨，我卻一點也不感興趣——如果當時我進取心強一點，說不定我還早已成了一個由特殊材料製成的共產黨員呢！可惜……

是強烈的求知欲，不無嘲弄地使我成了共產黨信用，依靠的對象。但同樣是強烈的求知欲卻幾乎葬送了我寶貴而又短暫的一生！“鳴放”、“反右”後，緊接着是“大躍進”。學生幾年不讀書，整天去搞什麼政治運動，大煉鋼鐵，我想不通。我把自己的苦惱全攤給了我的哥哥——我只有一個兄弟。想不到兩個星期後，我的信全被轉到了我的組織那裏。

“我們的教育要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，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。”連毛主席都這麼說，而你李從文竟膽敢背着組織逆黨的路線，方針而動！這不是徹頭徹尾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又是什麼？政治上極不老實，對抗“反右”，對抗黨的教育方針，很快我的政治學習組組長被撤掉了。先是團支部書記找我談話，要我認識自己問題的嚴重性，並向組織進一步交代自己的問題，接着便召開團支部會議、班級會議，對我進行挽救、幫助——實際上是批鬥！我交代了一次又一次，越是交代，越是講不清楚。我的家庭出身，我在“雙反交心”中自我暴露的一些思想問題，都成了我反動透頂的罪證。

那個時代，誰最左，誰就是最革命。批別人要無限上綱，如果上綱上到可以把被批判者打成右派或反革命，那就

說明批判會開得成功，說明批判者的發言最爲有力，最有階級感情。“反右”中，一些同學開始被批判時，問題似乎都並不嚴重，有的只是自由散漫，平時愛發幾句牢騷，但批了幾次之後，小問題上綱變成大問題，小會批變成大會批，接着便難逃厄運，被打成了右派或反革命分子——這幾乎是一個青年學生蛻變爲右派，反革命時所遵循的一條不變程式！

在批鬥我時，幾個調幹生瞪眼睛、拍桌子，說我交代極不老實，說我是漏網右派，說隱蔽的敵人比公開的敵人更危險！他們裝作無比憤慨地要求組織開除我的學籍，遣送我回原籍監督勞動——這些調幹生圓滑世故，我當政治學習組組長時，捧我捧得最肉麻的是他們，現在踩我踩得最凶的也是他們！別看他們平時自卑、遲鈍，考試老是不及格，但搞起階級鬥爭來，卻個個判若兩人，慷慨激昂，能沖能殺，他們一定調，我問題的性質就只能在此基礎上被層層加碼。批鬥我的人說，我要重新做人，我只有老老實實，全部、徹底交代自己的問題——我寫的交代材料，疊起來足足有一尺來高，小會、大會上交代了一次又一次，可交代來，交代去，就是講不清楚。他們說我頑固，說我態度惡劣是最大的問題……此時朝露和我的通信已經中斷，在這個世界上，活着沒有人關心我，去死，又似乎還太年輕，正當我覺得這樣也不是，那樣也不是時，想不到對我的批判卻突然不了了之。僥天之幸，我被當作了人民內部矛盾處理：我沒有被開除學籍，更沒有被劃成漏網右派。

我沒有被劃成漏網右派，大概是過去他們太信用我了。現在若要把我打成右派，這豈不說明他們瞎了眼睛，把階級敵人當作了依靠力量！階級鬥爭觀念糊塗的人，他

的政治生命還會長久嗎？他們可以不要我的政治生命，但他們決不會不要自己的政治生命！再者此時“反右”已近尾聲，也無需我再去補員湊數。

我沒有被打成漏網右派，但我的畢業鑒定被寫得很差很差，我的畢業分配也分得很差。同學們都到科學院、復旦大學、南京大學去了，我一個考試成績全部優良的高才生，卻被分到了一所很少為人知道的農村大學——曲阜師範學院。

我還沒有去報到，曲阜師院的趙副院長就向已在那裏工作的一位溫州同鄉介紹說：“此人業務不錯，但政治上不行！”除了階級烙印，至此，我臉上又被戳上了一記思想反動的履歷印記。我以為這個印記此生是擦不掉了，想不到一九六二年運動糾偏時，校人事處轉給我一封山東大學黨委的來信，說過去對我的批判是錯誤的，我寫的交代材料可全部索回，或叫曲阜師院人事處當着我的面把材料燒毀。我看完這封信，當即向校人事處處長表示：我只教我的書，我永遠不會去反黨反社會主義，這些材料就讓它擱在檔案袋裏好了。我不想過問政治，但政治卻總是像一個糾纏不休的無賴一樣，使這些本該廢棄的材料一再起作用。“四清”、“文革”中，這些材料就成了我是一個漏網右派的毋庸置疑的證據！

三

那個男子不鍾情，那有少女不懷春？中學時代，我愛上了一個低班女同學，她叫柯朝露。考上大學後，我明確告訴她我愛她，我對她說，此生此世我一定要努力不懈，有所成就，我要把自己一切的一切全都奉獻給她！她給我回信，說收到我的信如如魚得水。她說暑假中她一直在等高考後我去找她，可想不到我竟不告而別就走了。她說自己到學校裏去找我，而我卻已走得不知去向時，心中真有一種不可名狀的失落和痛苦。爲此，她說自己曾悄悄地流了好幾天的眼淚。後來想想我一定會給她寫信，所以過了幾天心裏就不那麼難過了。她說等信的滋味很不好受，她要我以後收到她的信後，兩天之內一定要給她回信，如果忙，哪怕寫一句也可以……我們相愛，愛得天真無邪。

五七年初夏，她幾次叫我暑假回鄉，其時學校裏正值“反右”白熱化，規定暑假中誰也不能走。我，一個出身反革命家庭，且又偶然身兼反右政治學習組組長要職的人，又怎麼敢擅自帶頭回去？如果母親還在，我還可以找一個母親病危的借口請假回去，可偏偏母親又早已不在人間！我沒有回去，我寫信安慰她，向她解釋。尽管她說自己理解，但她的信還是逐漸、逐漸地少了，而且字裏行間，情緒也愈來愈差，感情也越來越含糊，就這樣，我們